

DOI: 10.16750/j.adge.2022.02.002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时代背景、逻辑意蕴和路径选择

王战军 常 琅 张泽慧

摘要：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把握百年历史成就与基本经验，胸怀“两个大局”是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战略出发点。新阶段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遵循优化调整、效率优先、协同发展、服务贡献和全方位开放的逻辑，切实转变发展方式，聚焦优化完善研究生教育体系、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升级、不断深化国际与交流合作新局面。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逻辑意蕴；路径

作者简介：王战军，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北京 100081；常琅（通讯作者），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1；张泽慧，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用于经济发展的新表述，十九届五中全会上被确立为“十四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高质量发展”随之被迁移进入高等教育政策话语体系。2020年，我国首次召开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由快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1]。2020年我国在学研究生达到313.96万人，位居世界前列。推动如此体量的研究生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极具挑战性的宏伟目标，世界范围内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深入领悟我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意蕴并探索其实现路径，对于实现研究生教育由大到强的转变，对于推进人才强国、科技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昭示了教育与国家发展、民族命运休戚相关。研究生教育位于教育体系的顶层，其战略地位更加体现在其教育自觉和使命担当之上。新发展阶段是“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胸怀全球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是谋划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基本出发点。

1. 全球大变局中研究生教育需要准确识变

深刻理解全球大变局是新阶段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进入21世纪，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数字化和危机常态化是全球大变局的集中呈现。从表面看，大变局反映出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实力对比的深刻调整。从本质讲，世界各国生产力的变化才是真正的幕后驱动力。

科技进步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和核心要素。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而至的是全球经济结构和创新版图重构。这是后发型国家在追赶超越过程中面临的一次重大战略机遇，唯有准确认识变局才能顺应大势，掌控局势，化危机为先机。高质量科技供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支柱，自主创新是打造全球创新高地的必由之路，而高层次人才又是推动高质量科技供给和实现自主创新的主力军。一言以蔽之，国际竞争是人才之争。因此，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刻认识全球大变局的关键节点所在，通过优化研究生教育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现精准破局，着力建设新时代全球人才高地。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新时代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编号：AIA210012）

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中研究生教育需要主动求变

始终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是新阶段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20世纪中叶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目标的确立使得我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研究生教育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现代化进阶的重要标志。现代化强国建设离不开高质量研究生教育。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生教育需要主动求变,切实肩负起培养大批高层次人才和产出大批高水平创新成果的时代使命。

着眼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但又不限于此。培养大批能够肩负起民族复兴重任的先进思想引领者和传播者,从而保证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也是新阶段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的战略资源。在此背景下,研究生教育需要更加深入主动聚焦“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么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迈向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都是过去从未碰到过的全新实践,不仅需要知识技术的创新创造,更需要先进思想理念的引领。研究生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塔尖,它区别于其他教育阶段的特征主要是知识和技术层面的创新性和创造性,以及思想理念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引领性。因此,新阶段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主动求变,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着眼于对国家、民族和全人类的服务贡献。

二、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意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高质量发展要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和动力变革。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进一步强调研究生教育“更多机会、更优品质、更加体验、更强力量和更大影响力”的发展目标。因此,新阶段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意蕴可以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1. 优化调整的逻辑

新发展阶段是兼具外因与内因、静态与动态的客观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因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外因则对事物发展起促进或延缓

作用。我国研究生教育从“外延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再到“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话语更迭进一步诠释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规模是外延扩张的“比例尺”,而结构则是内涵和质量的“晴雨表”。结构优化理论认为,系统的最优效果是通过调整其各子系统的层级序列、数量比例、优先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正面效应,消减负面效应而实现的。新阶段我国研究生教育在稳步发展规模的基础上着力优化结构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冲击下,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结构、类型结构亟须调整。考虑到研究生教育之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作用^[2],区域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一直以来,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笼罩在被“卡脖子”的阴影之下,归根结底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短板和对冷门学科不重视所致。鉴此,进一步优化学科结构是当务之急。其次,美、英、德等研究生教育强国均高度重视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每年授予的专业学位数量远远超过学术学位数量,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2025年,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将扩大到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而2020年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616214人,占研究生招生总数的55.69%,进一步优化类型结构势在必行。最后,面对新时代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研究生教育高地布局规划,学位授权在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同时也要结合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东部区域发展实际需求,加强对上述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地区的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区域结构。

从规模上看,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纵深推进,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进一步提升,适龄人口中有继续攻读研究生意愿的人数持续增加。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为201万人,2022年报考人数增至457万人,研究生报考人数在五年时间内增长了1.27倍。有学者预测,二十年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可能接近80%,其中20%将接受研究生教育,每年招生人数可能是目前的二至三倍^[3]。综上所述,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结构、类型结构、区域结构和发展规模均有较大的优化调整空间。

2. 效率优先的逻辑

进化论认为,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低级者将逐渐被淘汰。经济管理学中由此派生的自然选择理论进一步强调,不能适应环境变化将导致效率低下并逐渐走向衰落或者自然被淘汰。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也曾简明扼要地指出,效率就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进入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主旋律,而淘汰低质量正是开启“正确方式做事”的重要前提。因此,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逐渐淘汰低质量的研究生教育,遵循效率优先思维。

那么,什么是低质量的研究生教育?过去较长时期内,我国研究生教育受“需求优先”的价值导向,进而重视数量,追求规模型扩招。2000年至2004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年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其中2000年招生规模增长率高达48.37%^[4]。在此过程中,研究生教育规模和质量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大。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战略地位的凸显,我国研究生教育迈入“质量时代”。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就此指出,质量型扩招除了要做到供给精准,还需要保证硬件配套、软件提质和监管到位。反观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现状,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硬件、软件和监管均显露出力不从心的态势,特别是导师指导质量需要给予较多关注。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队伍质量决定着人才培养质量。当前我国研究生导师队伍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导师队伍结构不尽合理,一方面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中具有行业和产业背景的导师相对缺乏,另一方面是导师队伍中博士占比不高。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高校教师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仅为36.20%、25.75%、22.38%^[5]。其次,导师队伍中“无项目、无成果、无经费”的“学术休克”现象依然较为突出,地方高校中此类现象更甚。最后,部分导师的指导能力有待提升。近年来,因为导学关系异化而生发的极端案例,引发了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造成了较多负面影响。

3. 协同发展的逻辑

规律是客观且普遍的。世界万物皆有其自身规

律可循,人才成长亦然。创新型人才培养需要遵循人才培养规律^[6]。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再到“九天揽月”,一次次的伟大实践锻造出了一批批拔尖创新人才,充分验证了“实践出真知和育人才”的论断,这是创新人才培养最根本的规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昭示着大学与社会之间“中心—边缘”关系的瓦解。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就此指出,越来越多的大学与社会“反向交流”将促进科学进步。质言之,大学与社会的互动频率、教育与实践的融合程度最终决定着人才培养的高度,基于实践的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优选方式。

我国研究生培养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分别以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和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但是当前两种类型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同质化倾向严重。从根本上说,这是不符合创新人才培养规律的。孙春兰副总理在研究生教育会议上强调,研究生要突出一个“研”字。科学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创新意识、开创精神和创造能力是学术型研究生最为重要的特点;在多元主体协同的专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职业意识、职业精神和职业能力是专业型研究生最为鲜明的特征。因此,在科学研究实践中培养学术型研究生,在产业实践中培养专业型研究生,是未来拔尖创新人才的必由之路。不难发现,当前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协同”存在概念泛化和虚化的倾向,虽然频频被提及,但是真正被具化为体制机制的情况鲜有发生。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作为育人机制方面的政策话语近年来屡见文端,常谈常新,但是我国研究生教育中基于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由政府、社会、大学、市场等多元主体协同并未落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口号化倾向。

4. 服务贡献的逻辑

约翰·布鲁贝克的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被现代高等教育研究学者和实践者奉为圭臬。国家优先发展教育和教育优先满足国家发展需要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最大秘密^[7]。政治性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性属性,也是实现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遵循。全球大变局中的世界各国已然将研究生教育列为国际竞争中必须牢牢掌

握的核心战略资源,发展研究生教育也成为涉及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的政府控制行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确立了“科技立国”战略,通过重视研究生教育提升科研水平,先后实施了“远山计划”“21世纪COE计划”“全球COE计划”“博士课程教育引领计划”和“卓越大学院计划”,极大地维持和提升了日本的科技竞争力和影响力。此外,日本“诺奖计划”与研究生教育贡献也密不可分。因此,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强调对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的服务贡献。

是否坚持“四个面向”是研究生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需求的观测点,也是其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试金石。进入21世纪,“天机”类脑芯片、“京华号”最大直径盾构机、火星车、一体化全身正电子发射/磁共振成像装备(PET/MR)是我国研究生教育面向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取得的一批代表性重大成果。但是,在抢占科技制高点成为当今大国博弈重要筹码的背景下,我国研究生教育仍然面临巨大挑战。《科技日报》报道,高端光刻机、核心工业软件等25项“卡脖子”技术和半导体加工设备、超高精度机床等60余项核心技术是我国亟须实现“从0到1”突破的关键技术。工信部调研数据显示,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中32%在国内尚属空白,52%需要依赖进口^[8],整体自给率不到三分之一。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在服务国家战略和满足经济社会需求方面多下功夫,下足功夫。

5. 全方位开放的逻辑

开放是超越民族和国家边界的文明互鉴。全方位开放是当代中国跨越式发展经验的理论升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将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进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可以说,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核心驱动力。《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开放的意见》擘画了更全方位、更多层次、更宽领域和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蓝图。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方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和使用人才是确立全球人力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在此背景下,秉持更加开放的发展理念是推动研究生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稳步推进,面对“更有影响力”的发展目标,我国研究生教育交流与合作需要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我国当前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实质性合作和重大攻关合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全球知识创新体系中,我国还处于由边缘向中心迈进的过程^[9],但是,受我国研究生教育飞速发展的影响,很多人并未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客观情况,认为我国已经开启了主导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新征程。《门户开放2020》数据显示,2019—2020学年全球国际学生的市场份额前三位仍然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其中美国以19.2%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客观上看,受到“逆全球化”思潮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研究生教育对外开放的步伐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阻挠。2021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数据显示,每年约3000~5000名中国理工类研究生办理赴美签证受阻。《中国日报》2021年7月6日进一步报道,500多名计算机、生物医学、电子电气工程、化学等理工学科研究生申请赴美签证被拒。

三、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实现了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阶段性目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新发展阶段,置身愈加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既是一项具有时代紧迫感的重要使命,也是一项面临诸多挑战的艰巨任务。

1. 优化完善研究生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

教育体系在教育整体发展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因此,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强调体系优化先行。从狭义角度看,研究生教育体系主要指结构体系,涵盖了规模、类型结构和区域结构等要素。

首先,稳步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是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刚性需求。创新驱动发展是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也是全球经济竞争力的核心理念。《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研究

发现,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0000 美元时,国家经济竞争力开始由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研发人员的规模和层次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创新驱动能力。2019 年,我国千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量为 2.723 人,韩国为 15.879 人,法国为 11.048 人,德国为 9.959 人,美国为 9.846 人(2018 年数据),日本为 9.846 人^[10]。同时,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中博士和硕士仅占 5.9%,而专科层次人员占 55.7%^[11],这与欧美发达国家由博士和硕士领衔的研发队伍不可同日而语。此外,2018 年,美国 25 岁以上成年人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比例为 15.08%,英国为 12.99%^[12],相比之下,我国实施学位制度四十年来共授予 1000 余万博士、硕士学位^[13],成年人中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比例约为 1%。因此,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其次,优化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是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20 世纪后期,我国研究生教育致力于为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以弥补师资和科研人才的断层。专业学位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社会现代化的程度决定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速度。进入新时代,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各行各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素养和专业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美、德、英、法、韩、日等现代化程度较高国家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均有力地支撑了各自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由此,进一步加大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规模,特别是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满足经济社会各领域对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需求的重要途径。

最后,优化区域结构和构建研究生教育高地是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题中之义。2020 年学位授权审核中来自中西部的 245 所高校共新增 1069 个学位点,占新增学位点总数的 53%;全国新增专业学位点 1308 个,占新增学位点总数的 65%,充分体现了向中西部地区和专业学位倾斜的原则。同时,现行的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在应对国家区域性战略布局时也面临着挑战。已有研究表明,一些东部省份和城市,研究生教育明显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2]。因此,学位授权审核机制应该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由省级学位委员会统筹区域经济社会

会发展需求和研究生教育资源进行学位点布局,这对于推动“四点一线一面”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建立若干研究生教育高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2.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旨归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是各级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要从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两方面着力。

从培养目标看,落实“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德性教育”是西方通识教育的观念,而研究生教育则以高度专业性为特征。德国古典大学强调道德和品格全面发展的“修养”,英国通识教育强调人格和心智训练的“教养”,美国通识教育则强调人与社会互动的“驯养”,培养有责任感公民。我国研究生教育首次将“德性教育”融入专业教育的范畴内,提出“立德树人”并将其置于高层次人才培养首要目标的地位,充分彰显了研究生教育的“中国理念”。未来国家事业成败的关键取决于能否培养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德性”和“才能”是统一且不可分割的。才能是道德的“压舱石”,道德只有载负在才能上才不至于流于空谈;道德是才能的“航向标”,个人才能的施展离不开社会,如何实现个人才能与社会的和谐共生需要道德的规范和引导,道德和才能兼备才能挑好“千钧担”。近年来,部分影视从业人员贴着研究生标签,顶着明星光圈,却成了“立德树人”的反面教材。近期,中宣部就此约谈了部分省市电视台,敦促其大力弘扬主流价值。因此,我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继续坚持立德树人、德才兼备的“中国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从培养方式看,创新培养模式是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步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的研究生培养模式逐渐显露出与时代的不协调,主要表现为培养模式单一、僵化,不利于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学位论文创新价值不高等问题。在全球顶尖的互联网企业中,国内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不能胜任岗位要求的情况屡见不鲜。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强化分类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硕士生阶段要更注重以课程体系改革为

支点,通过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专业化教育后移趋势明显,硕博贯通培养将成为研究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通道。学术型硕士生的学习和研究可以看作是博士候选人的准备阶段,要积极推进科教融合,要用系统的课程学习和科研训练激发学生的创新性和创造力,使其最终具备科学研究的核心素养。对于专业型硕士生来说,当前以校内培养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适应工业革命 4.0 时代对于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已经走在知识供给的前头。因此,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要深度推进产教融合,构建行业产业深度参与的人才培养机制,学校与协同培养单位共同制定培养方案、编制教材、开发课程、产出科研成果等,实现创新链、人才培养链和产业链的无缝对接。

其次,博士生阶段要更加注重以创新和创造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学术型博士生培养要更加注重原始创新性,博士学位论文是学术原始创新的重要载体,因此,学术型博士生应该围绕各自领域的基础问题、前沿问题或重要问题做出创新性贡献,补充、完善和发展现有知识或方法体系,对学科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专业学位博士生培养则要聚焦具体专业领域打造领军人才,强调培养解决实践中复杂问题的创造性能力。专业学位博士生需要围绕各自实践领域的现实问题、难点问题和重要问题进行系统和创新性的分析,提出合理的建议或可行的解决方案。

3.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研究生导师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实施主体,导师队伍建设水平决定着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水平^[14]。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导师规模不断扩大,从 1990 年的 5358 人增长到 2000 年的 88825 人、2010 年的 240465 人,2020 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 500906 人,三十年间增长了 92 倍。但是,导师队伍建设出现了明显的滞后,主要表现在导师队伍结构不合理、导学关系异化,以及部分导师出现“学术休克”现象和责任感、荣誉感不强等方面。基于此,推动导师队伍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进一步优化导师队伍结构。一直以来,

大学中存在对于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割裂认识,导致导师队伍的学科专业结构无法满足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需要。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育人机制的牵引下,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需要吸纳更多行业或产业界专业人士的加入,实质性推进双导师队伍建设。同时,导师队伍结构不合理还表现在博士率不高方面。已有研究结果显示,我国“985 工程”高校教师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均值为 73.82%,普通地方高校这一比例仅为 14.04%^[5]。相比之下,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高校教师博士率均处于极高水平。其中,美国研究型大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教师博士率就基本达到 100%,甚至连没有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授权的普通社区学院的教师博士率也达到 13%^[15]。因此,进一步提高导师队伍的博士率有利于我国研究生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其次,建立导师岗位的动态管理机制。通过构建指导过程评价和指导成效评价相结合,年度评价和聘期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导师自评和学生评价、同行评价、管理人员评价相结合的多维评价机制,对导师岗位进行动态管理。对于连续两年处于“学术休克”状态的导师要启动强制退出机制。最后,通过树立优秀导师典型和指导案例典型,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引导导师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大先生”,做到“安心指导、热心指导、静心指导”,不忘立德树人的初心,牢记为党育人和为国育才的使命。

4.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内源动力

学科专业结构是国家科技发展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的直观反映,也是人才供给侧与经济社会需求侧的接合点。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新趋势,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新变化,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升级刻不容缓。

首先,要深刻认识和理解基础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根基作用。基础学科是左右时代变迁的核心力量。要想免受“卡脖子”之苦,必须瞄准国家高、精、尖、缺技术领域,大力开展“一流学科培优”行动,聚焦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探索和发现解决“卡脖子”问题的

科学和技术原理,同时瞄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科技前沿和高端芯片、化学制剂等关键领域凝练科学问题,拓展全新的认知疆域,立足长远,以“十年磨一剑”的态度加强基础学科的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同时,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推进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应用学科领域的紧缺人才培养。其次,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推进交叉学科建设。进入21世纪,知识形态发生了很大改变,与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是,信息化时代的知识更多表现为差异化的知识,体现出知识的高度整合和高度分化。知识形态的变化决定了知识结构的调整。传统经验性知识和普遍性知识形态下的知识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不同知识领域之间泾渭分明。而新知识形态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新知识结构的出现。在此背景下,作为知识结构载体的学科专业目录需要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注重前沿交叉学科,以应对学科知识高度分化和高度融合的需求。研究数据显示,近25年中诺贝尔奖项中有近一半的成果来自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2021年,国务院新增了交叉学科门类,并设置了集成电路和国家安全学两个一级交叉学科。但是,未来要产生更多的科技突破创新,还需要给予交叉学科高度的战略关注。最后,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构建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极具引领力和凝聚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是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充分发挥育人功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主渠道,是不断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综上,以加强基础学科、重点关注交叉学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核心的学科专业调整升级是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源动力。

5. 深化研究生教育国际交流新局面:高质量发展的外部诉求

全球化时代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各国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交流和互鉴。研究生教育是科学技术创新、文化艺术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平台,其高质量发展也必然要顺应国际化的外部诉求。进入新阶段,

面对新目标,深化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交流既要主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也要坚持“自主培养和国际培养相结合”的宗旨。

首先,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要以服务国家全面对外开放战略为根本。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秘诀。进入新时代,“开放”成为新发展理念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形成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需要更高水平的创新引领,而高层次人才又是推动创新的核心要素。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16]。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条件和培养能力均有了实质性提升,国家主管部门和培养单位需要通力合作,从政策、制度和实施三个层面吸引更多国际优秀青年到中国来攻读博士和硕士学位。世界一流大学云集的美国也是公认的研究生教育强国,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起步早、投入高、吸引力强。早在1958年美国国会就通过《国防教育法》,首次为国际研究生提供奖学金。美国仅1977年用于国际研究生项目的经费就高达8800万美元。因此,不断开创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新局面,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研究生教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肩头重任。

其次,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坚持自主培养为主体、自主培养和国际培养相互促进的原则。截至2020年,我国自主培养的研究生超过了1000万,基本实现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在“更大影响力”成为新阶段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的背景下,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规模亟待进一步扩大。2019年来华留学生数据显示,在华留学生共计397635人,其中来华留学研究生占在华留学生总数的13.47%,占在学研究生总数的1.87%。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9年数据显示,美国国际研究生数量为377943人,约占美国在学研究生总数的12.3%。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研究生教育深层次国际交流与合作

还十分有限,推进研究生教育深层次国际交流与合作不仅要加强国内高校与国际高水平大学的交流合作,而且要完善校际交流合作模式,推动开展更多实质性校际交流合作,如学生交换、学分互认、项目联合攻关等。综上,在“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我国研究生教育需要依靠更高水平的“引进来”和更高质量的“走出去”的“双高双开放模式”,形成自主培养和国际培养相互促进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 [1] 洪大用. 研究生教育的新时代、新主题、新担当[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1(9): 1-9.
- [2] 李立国, 杜帆. 我国研究生教育对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1(4): 40-49.
- [3] 杨卫. 研究生教育动力学[M]. 北京: 科学出版, 2021: 12.
- [4] 王战军, 周文辉, 李明磊, 等. 中国研究生教育七十年[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99.
- [5] 徐志平, 沈红, 张冰冰. 我国高校专任教师博士率的结构特征及其成因分析[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9(2): 16-22.
- [6] 谢维和. 把握人才培养规律 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N]. 中国教育报, 2012-08-07(2).
- [7] 袁振国. 双优先: 教育现代化的中国模式——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作[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8(4): 1-17.
- [8] 曾纯. 如何看待短板? [J].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 2018(7): 7.
- [9] 马金森. 生生不息的火焰: 全球科学中的中国[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20(4): 2-33.
- [10] OECD. Researchers[EB/OL]. [2021-10-21]. <https://data.oecd.org/rd/researchers.htm#indicator>.
- [11]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中国科学技术与工程指标[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17.
- [12] The World Bank. Labor force with advanced education[EB/OL]. (2020-03-01) [2020-05-21].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search/indicators?search_api_views_fulltext_op=AND&query=doctoral%20degree&sort_by=search_api_relevance&f%5B2%5D=type%3Aindicators.
- [13] 王战军, 张泽慧, 常琅. 中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的历史演进——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1(9): 10-17.
- [14] 翁铁慧. 全面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 推进新时代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在 2020 年省级学位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0(11): 1-6.
- [15] 科恩. 美国高等教育通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72-73.
- [16] 习近平出席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21-09-28) [2021-11-11].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9/28/content_5639868.html.

(责任编辑 刘俊起)

DOI: 10.16750/j.adge.2022.02.003

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特点、要求和战略重点

别敦荣

摘要: 普及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普及化发展不仅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还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它将建构一个更加公平、协调、均衡发展的新体系。研究生教育发展是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应有之义,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推进,研究生教育发展既要为解决社会存量不足、刚需较大问题而增强人才培养能力,又要为解决培养模式陈旧、质量和品质提升空间大的问题而加强研究生教育内涵建设,还要着眼未来,谋划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建设更强大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为此,应当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形成高质

量发展格局;加快填补发展洼地,构建均衡发展的研究生教育体系;着力开拓新发展空间,造就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生力军;创新来华留学教育模式,树立我国留学生教育品牌。

关键词: 研究生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战略

作者简介: 别敦荣,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 361005。

普及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大势。有人可能认为,普及化主要是高等教育向下延伸发展的趋势,而与居于最高端的研究生教育关系不大。表面上看,这样的认识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衡量普及化发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2017 年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质量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17JJD88009)